

卫生院当医生,真的是全科

1965年6月26日,毛主席作出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指示,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。1968年,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,被分配到甘肃灵台县什字卫生院,开始了医生生涯。

卫生院人才济济

小小卫生院,可谓人才济济:有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生蒯锡侯、刘燕儒,有北京医学院毕业生林培文,还有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下放的医护人员李天才、陆雪瑶、张金龙、夏美贞。院长王养明是当地人,他是兰州医学院毕业的老大学生。

那时甘肃农村医疗条件很差,医疗水平很落后。但就是在那个偏僻的农村,

我们8个大学生凭着年轻人的激情,做起肠梗阻、胃穿孔、阑尾炎、剖宫产、宫外孕、骨折脱位、扁桃体鼻息肉等手术。只要病人有需要,我们都尽力去干。周围十里八乡,一般的病都能在当地解决了,我们得到老乡们的认可和赞扬。

真正是“全科医生”

那时叫“医护工一条龙”,我们也确实是样样都干——自己给病人诊断,自己拿来药打针,连病房卫生也要自己打扫。卫生院只有一台15毫安的小X光机,由一个医生兼管。这个医生休息时,我们自己去开机做检查。早上来个高血压病人,我们算内科;中午来个眼睛被树枝刮伤的,我



王正(右)在甘肃灵台农村

们算眼科;下午来个从马背上掉下来肩关节脱臼的,那我们算骨科;傍晚来个阑尾炎病人,可就要全院动员做手术了……至于开刀,我们也没有专职的麻醉师,都是你负责开刀我给你打麻醉。大家经常大半夜不能睡觉,熬个通宵也不鲜见,第二天照常看门诊管病房。当地有地方病——克山病、大关节病流行,我们还要下乡搞防保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我们那才是真正的全科医生。

抢救危急病人

那时,最有成就感的还是开刀——当即救人一命。记得当年我们抢救了一个很危险的胃穿孔病人。那个病人还是壮年,已胃痛好多天了,但农村人有点病都是扛着的,那天半夜他痛得实在受不了了,才由6个青壮年从山里抬出来。到医院时,人已休克。我们用那架小X光机检查了一下,就马上决定开刀了。也全靠农村人身体底子好,开刀后,他还是硬挺过来了。为此,他婆娘又是哭又是笑!

1974年,我被调离什字卫生院,到了浙江。50多年过去了,当年一起在什字奋斗过的老同事们,你们和家人都还好吗?(上海王正 81岁)

观赏菊展



1982年,我在鄂西北竹溪县工作。那个年代,文化娱乐活动比较单调。深秋时,县文化部门举办首届菊花展,吸引全城居民去观赏。我和两个同事也兴奋地去观展,留下了这张照片。照片上,右一是我。(湖北襄阳 李培竹 64岁)

工作调动

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在邯郸市公安局峰峰矿区分局义井派出所任民警,下农村、进企业,辛勤工作,与基层单位的同志结下深厚友谊。1962年4月,我调离工作岗位,一些同志特意赶来与我照了合影。照片中,前排中间是我。(河北邯郸 石贵生 85岁)

第一次接电话,有点糗

1993年12月初,我从一所中学调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。刚去时,一切都感到新鲜,工作热情也高,总想着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
当时,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总共30多人,在一个院里办公,除几个领导那里外,只办公室有一部电话。办公室有位负责上传下达的同志,一般来电话都是她接。那时候,人们的通讯方式主要还是写信,私人之间电话很少。我到人大上班第一天,电话只响了5次,其中3次是工作通知。负责接电话的女同志接听时做好记录,通知相关领导。有一次来电是找办公室的一位同志,她随即让那人把电话

接了。还有一个电话是找代表科的一位同志,她放下电话,到办公室门口,冲着代表科的方向喊了一声:“某某,接电话!”这一喊,整个院子都能听见。

第二天刚上班,负责上传下达的同志因为有事没在办公室,偏偏这时候电话响了,我几步赶过去把听筒拿了起来。这是我第一次接电话,内心有一种小小的激动。电话是找法制科的一个同志,听他说完,我说了句“您稍等”,就把听筒扣在了机座上。因为刚来,我对很多同志还不认识,又不好意思站到门口大声喊,所以,三步并做两步,急匆匆地到了法制科……

法制科那位同志风风

火火地跟着我赶过来,一进屋便愣住了。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,问:“你怎么把电话挂了?”看我不知所措的样子,他这才意识到我还不不懂这项“业务”,于是,笑着问了我一句:“来电话的人说是谁,是哪个单位的了吗?”我摇了摇头,说没有。他说:“等他再打来再说吧。”接着,他教给了我接电话的常识:“再来这种电话,你要把听筒放在桌子上,不要扣在机座上,扣在机座上就等于把电话挂了,不仅耽误事,而且对来电话的人是不礼貌的。”

这就是我第一次接电话的糗事,30多年过去了,还时时浮在我的脑海。(河北河间 李秋河 57岁)

吸烟止疼,染上40年烟瘾

我第一次吸烟是在60多年前的一个秋天。当时,我当兵还不到一年,部队到太行山区修建营房,借住在当地农民的房子。我们每天天不亮上山,天不黑不下山,中午饭都是由炊事班的战士从山下送到工地。

由于条件有限,饭菜送到山上都不太热了,吃凉饭的次数比较多。慢慢地,我得了胃疼病。一天,班长让

我在住处休息,好心的房东大娘问我:“你是不是生病了?”我回答说:“我有点胃疼,班长叫我休息两天。”大娘就说:“我们山区有个俗语,‘吸烟能止疼’。”说着,她从屋里拿了一支烟给我:“你慢慢吸几口烟,就能止疼啦。”我接过烟点燃,吸了几口,也可能是精神作用,胃疼果然好了一点。从此以后,我学会了吸烟,这

一吸就是40年。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,我一直在机关工作,晚上加班时,烟就是我不缺少的东西,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吸两盒烟。

随着年龄增长,因为患病,我尝试戒烟,结果不仅没戒掉,反而越吸越多。直到2000年春节前,体检医生说我肺已开始变黑了,我才彻底戒烟。(河南商丘 李振庭 84岁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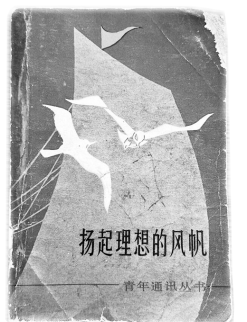
■“第一次领工资”

战友“敲竹杠”

1969年3月,我和战友复员,被分配到各个行业工作。4月末,首次领工资,大伙相聚,工资是热门话题。最后发现,我的工资有41.93元,比其他人多了三五元。战友们要我把每月多的3元多钱拿出来,作为集会的招待费。我说,下个月一定照办。他们却说,现在就请。

幸好我把工资交父母时,留下了5元零花钱,不然,非弄得措手不及。战友们在小卖部门前席地而坐,吃着喝着笑着,甚是高兴。战友“敲竹杠”,并非为吃喝,而是友谊的体现和情怀的寄托。怀念那个时候!(辽宁沈阳 孙连杰 82岁)

上交工资 母亲给我留大半



1986年3月,我领到人生第一份工资,66元。攥着带着体温的钞票,我兴冲冲地交到母亲手里。母亲数了数,抽出一半塞回我手中:“这36块你留着买书。”见我愣着,母亲说:“这些年你总借书看,如今上班了,该有自己的书了。”母亲的语气很轻,却让我瞬间眼眶发热。

第二天,我去了邮电所。营业员听说我要订阅《农村青年》《新村》两种刊物,惊讶地打量着我——那时农村自费订杂志的人并不多见。周日吃过早饭,我蹬上自行车赶往30里外的县城,买了《扬起理想的风帆》等5本书。

母亲不识字,却比谁都懂得书的分量。这些刊物和书籍,滋养了我的人生。如今母亲已离世多年,而我总会想起1986年那个春天。(吉林通榆 王继民 59岁)